

天生的作家

——訪嚴歌苓

田新彬/訪談

2006年9月台北天母

九月下旬，台北天母西路美國在台協會宿舍大廈，一個七十坪大、四周都是大窗、視野極佳的單位住宅，米色地毯上散放著大大小小的盒子、幾個非洲木雕、待掛的畫、幼兒手推車……餐桌椅背上還搭著一件小小孩的圍兜、一隻小襪子。一眼看去，就知道主人剛搬進去，尚未佈置妥當。

這，就是紅遍兩岸的旅美作家嚴歌苓在台北的新家。嚴歌苓的丈夫——中文名字王樂仁的美國外交官，最近奉派出任美國在台協會發言人，任期三年。嚴歌苓說，她要利用這個機會好好來認識、親近美麗的寶島。

其實，嚴歌苓對台灣並非全然陌生。一九九一年她以〈少女小漁〉獲中央日報短篇小說獎，九五年《扶桑》獲聯合報長篇小說獎，九七年《人寰》獲中國時報百萬小說獎……。十年內，她把台灣所有文學大獎得個遍，尤其〈少女小漁〉獲獎時，嚴歌苓剛從大陸到美國不久，邊讀書邊打工，正是生活上最窘迫的時候，台灣各類文學獎的優厚獎金，幫了她很大的忙，至今仍深深地感念，這也是為什麼知道丈夫被派到台灣工作後，她特別興奮的原因。

在此之前，嚴歌苓來過台灣幾次，或是領文學大獎，或是為新書在台出版作宣傳，但每回來台都被媒體簇擁著，沒有太多的時間細看台灣。這次，她希望能到鄉下或山裡住住。對什麼都好奇的她說：「到哪裡，大城市都是一個樣子，鄉村則各有不同面貌。聽說台灣的原住民粗獷、豪放，喜歡喝酒、跳舞、唱歌，有自己獨特的文化，我迫不及待想去看看。」問她會不會以台灣為背景寫一本小說，她笑著說：「看看吧！我在西藏高原住了一個多月，寫了《雌性的草地》；前年到河南農村的窯洞裡住了一段時間，回去寫了《第九個寡婦》。」

嚴歌苓在離開中國到美國之前，她的寫作才華已露端倪，寫過《綠血》、《一個女兵的悄悄話》、《雌性的草地》三部長篇小說。一九八九年她離開大陸到芝加哥哥倫比亞藝術學院留學，西方文明大大拓展了她的文化視野，自身及周遭朋友的血淚移民經驗，則觸動她關注海外華人的生存狀態，於是陸續提筆寫下〈少女小漁〉、〈女房東〉、〈紅羅裙〉、〈海那邊〉、《扶桑》、《無出路咖啡館》等。這些作品雖然也以移民為背景，卻以多元文化的觀點深入探討、刻劃普世的人性，大大超越了早期移民文學懷鄉思親的情感渲泄、移民生活奮鬥掙扎的寫實經驗，以及對東西方文化差異慨嘆之類的狹窄寫作視角，氣度明顯更勝一籌，儼然成為海外新移民文學的典範，更是海外華文文學研究者分析、討論的重要文本。

就在評者熱熱鬧鬧地從女性主義、文化邊緣、文化錯位、離散、漂泊等各種角度分析著她的作品時，嚴歌苓的筆鋒卻又一轉，寫起中國大陸土改、文革題材的小說。去年出版的《穗子物語》(台灣版由三民書局出版)，透過一個女孩的眼睛看「文革」時人性的扭曲，明顯有嚴歌苓自己的身影；最新出版的

《第九個寡婦》(台灣版由九歌出版社發行)，描寫大陸「土改」時期，一個河南村婦將遭到槍決卻意外未死的地主公公藏在地窖二十多年的故事，書中大量使用當地土語，被形容為「土得掉渣」，在大陸甫出版即銷了十萬冊，讓她輕易撕去「海外華文女作家」的狹隘標籤。

對這種出人意表的轉變，嚴歌苓的說法是：「剛到美國，對西方事物處處感到新鮮，覺得都是寫作的好題材，可是在美國住了十五年，再回頭看大陸，卻又覺得大陸生活很新鮮，特別是反思自己童年時期舞蹈演員、青年時期文藝大兵的經歷，還有以前看到的或聽到的一些動人故事，都是那麼的獨一無二，讓我有一種非寫不可的衝動。不論美國或中國，都只是我寫作的場景，人性的複雜多變才是我真正想呈現的。」

嚴歌苓一向關注社會邊緣人，筆下所描述的也多是邊緣人或社會底層人物。《扶桑》裡的中國妓女、〈海那邊〉的智障少年泡(Paul)、〈誰家有女初養成〉被拐賣的巧巧、《第九個寡婦》裡的童養媳王葡萄，都給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並為他們一掬同情之淚。她說：「邊緣人多半處於非常態的環境下。在被逼到絕境時，人性最本質的東西常會蹦出來，那才是我最感興趣的。」

八一年至今，散文及電影劇本不算，嚴歌苓寫了九部長篇小說，許許多多的中、短篇小說，一本傳記，以及一本英文小說，作品不只風格多樣，產量也讓其他作家既妒且羨。嚴歌苓把這個成績歸功於豐富的想像力。她說：「我寫小說時從未有意識地要表達什麼，我只對人物及故事感興趣，聽到一個有趣的故事，就想把它好好講出來，看到一個特殊形象，即引動我意念飛馳，不自覺地為他添血加肉。我的寫作狀態是非常渾沌的，寫作過程常是一鼓作氣如泥沙俱下，絕少回筆，寫完也不修改，以免破壞了來自內裡的、最直覺的腔調。」

文學研究者常常分析她的作品裡有著什麼什麼意象，這些意象意味著什麼。嚴歌苓很坦白地說：「寫作時，若是揣著這些想法，我恐怕什麼也寫不出來了。」

寫作前，嚴歌苓常花很多時間找資料，特別是收集細節，寫《扶桑》時，她用「掘地三尺」形容自己鑽在圖書館故紙堆裡找資料的樣子。待蘊釀成熟開始執筆時，她便謝絕所有社交，每天早睡早起，振筆疾書，任想象力奔馳。她一天可寫五、六千字，用鉛筆寫，省力，修改錯字也容易。如此這般，《扶桑》兩個月就寫完了；二十多萬字的《第九個寡婦》，也只寫了兩個多月即告收筆。

不寫稿的時候，嚴歌苓就比較放任自己。喜歡看電影的她，一天可以看好幾部，哪裡有熱鬧往哪裡鑽，和朋友聊天喝酒，深夜不散。「我喜歡苦樂對比懸殊，幹什麼都盡興。」臉蛋甜美、身材細溜溜的她，說這話時，竟有著男子的豪邁。

文學是一種心靈的奔馳，文學家需歷遍各種情境與生活，才能激盪出匪夷所思的小說情節。之所以能跳脫純粹中國的思維，以更為寬廣的視野來觀看、書寫這個世界，嚴歌苓自承異國婚姻對她創作生涯的影響至為巨大。她說：

「從婚姻裡，我瞭解了美國人的文化和思維方式、心理結構。瞭解了這些，我不論寫什麼，都不只是單從中國人的視角來寫。」

嚴歌苓十二歲就進了成都軍區文工團，成為專業舞蹈演員，後來又在軍中從事文藝創作，二十五歲才離開部隊。王樂仁是美國外交官，能說流利的華語，兩人相識於華盛頓。結婚前，嚴歌苓在中國的軍人背景，受到美國 FBI 的懷疑，調查跟蹤外，還規定她必須接受測謊。王樂仁認為這是污辱，寧願辭去外交官的工作，不讓她接受測謊。婚後有幾年，王樂仁失業，嚴歌苓暫時放下小說，專寫電影劇本，一肩挑起家庭生計。直到前年，王樂仁才申請復職。嚴歌苓說：「我的先生是一直非常誠實且通情達理的人，對我非常好，若沒有他，我根本無法專心寫作。」

在芝加哥哥倫比亞藝術學院修習英文寫作的經驗，讓嚴歌苓多年來對用英文寫小說一直躍躍欲試，卻總覺得準備不夠充分。去年，她覺得時機成熟，一鼓作氣寫了《宴會蟲》(*The Banquet Bug*) 一書，今年六月已在美國出版。這本書寫一個冒牌記者到處參加美食新聞發布會，趁機騙吃騙喝的有趣故事，對中國吃的文明頗多著墨。嚴歌苓到美國後才開始學英文，從聽、說學起，練就用英文思考的能力，不像很多中國人說英文必須先在腦子裡過一道中文，因此，下筆快速毫無滯礙。被問及用英文書寫幽默會不會有文化上的「隔」？能否出入中西兩種幽默間游刃有餘？嚴歌苓自信地說：「我先生是一個非常愛講笑話的人，我早從他那兒體會西方幽默的真諦。」

兩年多前，因為拍戲的需要，嚴歌苓和演員陳沖到安徽馬鞍山市的一家孤兒院參觀，看見一個小嬰兒不斷朝她微笑，心念一閃，立時動了收養的念頭。經過冗長的領養手續，她和王樂仁終於有了一個女兒，小名叫 Baby。朋友都說 Baby 長得很像嚴歌苓，讓她非常開心。這回，兩歲多的 Baby 也隨他們一起來到台灣。「有了孩子的羈絆，以後不大可能再四處亂跑了。」嚴歌苓篤定地說。

今年的台北，秋天似乎來得比往年早，九月下旬，下午五點，天色已開始昏暗起來了，歌苓要到附近的托兒所接 Baby。我們相偕步出她家大門，微笑揮手道別。走了十幾二十步路，回望那穿著恤衫、牛仔褲，推著幼兒車的嚴歌苓，不禁疑惑起來，那明明是一個心滿意足的母親嘛，怎麼竟然能從她手中蹦出那麼多動人的篇章呢？